

女书文化

李庆福 / 著

研究



人民
文学
出版社

女书文化

李庆福 / 著

研究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书文化研究/李庆福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ISBN 978-7-01-008027-7

I. 女… II. 李… III. 女书-研究 IV. H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234 号

女书文化研究

NÜSHU WENHUA YANJIU

李庆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17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027-7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女书文化研究 25 年 (代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被中南民族大学专家发现,并向学术界推介了这种文字,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至今女书文化研究走过了 25 年,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一批批成果陆续问世,中国女书学正在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

女书被发现时就像闺房中的女红,仅为当地妇女所独用。女书一般书写在自制的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有些则绘织在织锦和花带上。经过近 20 多年来的收集、整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的女书作品有 500 余篇,约 30 余万字。女书文字有着自己独立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约有 2000 多个字符,是一种记号音节文字。大多一音多义,同一个字既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写法,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读音,但能独立运用于日常生活。女书作品内容多是表达妇女内心感受或记载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像装帧精美的《三朝书》及一些个人传记作品,如《高银仙自述》、《义年华自传》、《胡慈珠自述》、《唐宝珍传》、《八女之歌》等。还有一些作品描述了古代妇女的不幸遭遇和悲苦生活,如《孤女怨》、《寡妇歌》、《没爷没娘跟嫂边》等。

女书文化与当地女红文化、歌堂文化、结交文化、婚嫁文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唱女书,习女红,结老同,赶庙会,“坐歌堂”,过“吹凉节”、“斗牛节”等,女书世界的女子们用这种内部交流的女性文字建

立了自己的一方净土。女书大都是能唱的诗体作品,以七言体最多,也有少量五言体。有些作品是纯粹的七言诗,但并不像汉语古典诗歌七律、七绝那样讲究严格的押韵对仗,也有个别为杂言诗体。当地妇女用女书编歌,还用女书翻译当地比较流行的汉语唱本。2000年暑假,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成员到江永铜山岭农场考察时,当时已经88岁的阳焕宜老人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女书作品,她一开始就唱起来了,而不是照着念,唱完之后再写。近90岁的老人拿毛笔写起女书来,还是一笔一画,写得相当认真,刚劲有力。写在纸张上的,叫做“纸文”;写在扇面上的,叫做“扇章”;写在手帕上的,叫做“帕书”;绣在布块上的,叫做“绣字”;织在被子、带子上的,叫做“字被”、“字带”。阅读写在纸张上的女书,叫做“读纸”,阅读写在扇面上的女书,叫做“读扇”;阅读写在手帕上的女书,叫做“读帕”。只要过年过节或是农闲时期,她们就用这种文字读唱娱乐、记事记史、诉说身世、互致信函、祭祀祈祷,男人对此既不过问,也不反对。女书的流传一般靠老传少,母传女,或亲朋好友相传,世代沿袭,绵延至今。她们用这种传女不传男的“密码”,经一代又一代的精心创造、完善,为自己圈出了一块男人禁入的领地。千百年来这种文字一直在岭南一带妇女中广为流传。据1931年7月由和济印刷公司印、曾继梧编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花山》(上册)记述:“花山,在层山岭之麓,石玲珑若花然。相传唐时,谭姓姊妹学佛修真,入山采药,相与坐化于此,土人于山顶立庙祀之。石既罗列有致,加以崇林美荫,磴道缘石罅以出,升降忘劳。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说明女书在江永县及邻近地区极为盛行,然而对它的研究却是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重视。

25年来,女书文化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出版了不少著作。召开了6次学术研讨会,在女书文字的特点、性质、流

传范围以及对它的抢救保护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第一,广泛开展田野调查,收集女书原始材料。女书被发现以后,女书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中南民族大学最早对它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先后 20 余次组织调查组到江永及其邻近乡村考察,收集了大量的女书原文资料。1992 年 6 月 12 日正式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中南民族学院女书文化研究中心”(现为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配备了专职研究人员。该机构现有研究人员 11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4 人,包括语言学、文字学、女性学、少数民族民族语言文化等学科方面的专家。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和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珠海市博物馆等科研单位及国外、港澳台也常有学者到江永县调查。其中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女士先后到江永调查达 30 多次。此外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外学者及港澳台地区的有关学者也纷纷闻讯到江永进行实地考察,有的外国学者到江永一去就是半年。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多年来,前往江永县及江华、富川和恭城等地考察女书文化的国内外学者达 2 万多人次。一些女书原始资料文集陆续出版,如官哲兵主编的《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 5 月);谢志民著《江永“女书”之谜》上、中、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这部文集最真实保存了女字的原貌,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二等奖;杨仁里、陈其光、周硕沂编译的《永明女书》(岳麓书社 1995 年 5 月);赵丽明等主编的《中国女书集成》(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3 月)、《中国女书合集》(中华书局 2005 年 1 月)。《中国女书合集》是目前收集女书作品最全的一部集子,但除了第一卷、第二卷可用外,其他三卷混杂了不少伪造女书字。

第二,召开了 6 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开展女书学术研讨活动。为了推动女书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南民族大学先后与有关单位组织召开了 5 次国内学术研讨会、1 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女书文化研

究成果。1991年9月21日,原中南民族学院发起召开了首次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会议在武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张舜徽、李格非、张正明、冯天瑜等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女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仍在使用的文字,在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妇女学、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等诸学科的研究方面均有重要价值,并充分肯定了中南民族学院在女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高度评价了该校在抢救女书这一珍贵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积极贡献。这次会议为后来的女书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不久,同年11月16日~19日,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清华大学、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南民族学院、湖南省江永县政府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的“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在湖南省江永县召开。来自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的60余名专家学者聚会女书之乡,深入到农家瑶寨,实地考察了女书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深入探讨了女书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著名学者季羨林、周有光教授还专为会议做了书面发言。我国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郑至慧、英国伦敦大学 Ilariasala 小姐还专题介绍了女书在海外的影响和她们的研究情况。这次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会后由北京语言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学术考察研讨会的论文集——《奇特的女书》。

2001年5月25~27日,中南民族学院女书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南省江永县政府又共同发起召开了一次“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暨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会议在中南民族学院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学术界同仁多达百余人,其中包括很多在全国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如汪宁生教授、陆耀东教授、朱祖延教授、刘守华教授、吴永章教授等。与会专家学者认真总结10多年来女书文化研究的业绩及经验,共谋女书文化抢救及开发之大计,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最后通过了《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倡议书》。这次会议成为新世纪女书研

究承上启下、开创女书研究新局面的一次盛会。

2002 年 11 月 19 日~22 日,在湖南省江永县举行首届女书国际研讨会。由江永县人民政府、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保护中心联合举办,其主题是“女书的传承与保护”。参加这次女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有国内 8 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和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普美(浦尾)女书文化村、女书园、女书传人高银先故居。会上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李庆福直接提出女书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议题,认为:申报女书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抢救和保护女书的需要。这次研讨会是和瑶族“盘王节”一起召开的,与以往的研讨会比起来,它的影响力更为巨大,更为广泛。这次研讨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在江永县举办的,不仅县里的干部通过研讨会提高了对女书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广大群众也因此增强了女书文化开发的信心。这次会议的举办标志着女书文化抢救进入实质性阶段。

2004 年 9 月 1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日本中国女文字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女书’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探讨会。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女书的历史、作品、文字、吟诵语言,女书的研究资料库和研究价值,女书的抢救与保护,女书的研究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世界上的文字,究其大概,分为表义文字和表音文字两种,汉字属于表义文字体系,而女书则属于表音文字体系中的音节文字。作为音节文字的女书,尽管在选字原理上并无奇异之处,但是这种仅属于女性专利的文字却是世界文字史上的独特现象,当地妇女流传下来的有限的女书作品是人间稀有的文物,不仅值得人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继续研究,而且还应该从社会文化、政治地理、民族民俗等多角度、多层面深入探讨。世界文字的发展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在记录语言的词的功能上,表义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表义、表音两种文字体系将伴随人类

历史永久共存。日本中国女文字研究会会长、文教大学教授远藤织枝,在谈到女书的地位时表示,女书这种湖南山村妇女创造的民间文字,可称之为“文化遗产”。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山村妇女能够创造出一套完整系统的妇女专用文字,在我看来是举世无双的。在过去的时代,人们往往认为女性富于模仿而不擅长创造,女书的产生则是对这种说法最有力的反证。关于女书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由于考证十分困难,学术界尚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也为进一步研究女书的历史提出了挑战。

2006年11月3日,第六届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湖北、湖南、云南、福建、贵州等省市的近50位专家学者在中南民族大学齐聚一堂,包括国内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民俗学家刘守华、汪宁生,女书研究专家谢志民、官哲兵等。专家们一致认为,应该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对女书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对女书如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南方山地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瑶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自己的文字,女书就是在瑶族历史上曾经广泛流传过的民族文字。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女书书面语是一种汉瑶混合语,既有汉语方言的成分,也有瑶语的成分,但与汉字没有渊源关系,是一种自源文字;女书是中国古老文种之一,它的发展经历了古越语、瑶语、汉瑶混合语的过程。揭示女书的文化内涵,对现代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与会专家一致建议成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学术委员会。最后,在中南民族大学上学的两名江永同学用女书为各位专家学者唱读了《女儿成长歌》,标志着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第三,大批学术成果问世。随着女书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女书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了一批女书文化的研究专家,发表了有关女书文化的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在女书文字体系的性质、渊源、

产生时代及与普通汉字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女书作为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这一问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此外在现代女书作为汉文的一种异形字问题的看法上也取得了相对的一致。同时出版了一批专著,像赵丽明、官哲兵著《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8 月);官哲兵编著的《女书——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 1991 年 1 月);官哲兵著《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等是女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著作。赵丽明著《女书与女书文化》(新华出版社 1995 年 8 月)、《女书用字比较》(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 9 月)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还有李荆林著《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珠海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 8 月又出版了梁晓霞女士 10 年女书研究的心血之作《中国女书》,该书以散文的笔调,从文字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角度,对女书文化作了多元的考证和思辨。谢明尧、李庆福等编撰的《女书习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图文并茂,详细论证了女书与古越文化习俗的关系,记述了女书流传区的社交、婚嫁、生育与丧葬、节日习俗,女书与女红文化习俗等。谢志民等研制的《女书有声电子字典》(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9 月),周硕沂的《女书字典》(岳麓书社 2002 年 11 月),陈其光的《女汉字典》(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8 月),官哲兵、唐功伟等编的《女书通》(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3 月)先后出版。这四部女书字典除了《女书有声电子字典》、《女书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外,其他两本都因混杂有大量伪造女书字而不宜使用。周硕沂、潘慎和王澄溪、欧阳红艳等在女书书法上都有自己的创新。潘慎已用女书将毛泽东诗词和孙中山的《总理遗嘱》、《香港基本法》等写成长卷,在全国各地展出。王澄溪已出版《澄溪女书书法字帖》(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2 年 1 月)。还有潘慎编撰的《女书辞典》等都即将出版。这些著作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提供了大量的女书研究资料,促进和推动

了女书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

国外和港澳台学者也十分重视对女书文化的研究。如美国的史凯珊,法国的苏梦婷、斐书馨,德国的艾娃,日本的远藤织枝和长尾一郎,中国台湾的姜蕙、郑至慧等。台湾女性文化研究专家郑至慧积极宣传鼓动港台学人对女书的研究,她资助出版了由官哲兵编著的《女书——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并和杨跃青等拍摄了女书专题纪录片《女书——中国妇女的隐秘文字》。“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学生姜蕙也多次到江永考察,1991年11月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女性密码:女书田野调查日记》。日本文教大学的远藤织枝前后已到江永9次,发表了一系列女书研究论文,出版了一部近20万字的专著《中国的女文字》(日本株式会社三一书房1996年6月15日),还资助出版《奇特的女书——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凯珊为了研究女书,毅然辞掉工作孤身一人多次来到江永,向当地老太太学习女书,已经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当地口语,并收集到大量的女书原文资料。

对女书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各级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也不甘落后,中国新华社、美国美联社、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中央电视台、重庆电视台、湖北电视台、湖南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等上百家新闻单位,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新华社记者采写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了内参。在新闻媒体的推动下,关注女书文化研究和抢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江永县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成立女书文化抢救保护中心,筹资兴建浦尾女书园和女书文化村,培养和保护女书传人。在学术界、新闻界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4月,女书被国家档案局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江永县政府正式立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10月,女书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18 项,“女书习俗”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2007 年,江永县争取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资金 20 万美元,创建女书数字博物馆和浦尾女书生态博物馆。2008 年,女书作为湖南省唯一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上报国家文化部门,女书申遗工作进程加快。

Contents

目 录

女书文化研究 25 年(代前言)	/ 1
------------------	-----

第一章 难解的中国女书之谜 / 1

- 一、女书的发现 / 1
- 二、困扰学界的女书之谜 / 4

第二章 女书是仍在流传的又一古老文种 / 16

- 一、女书的独特性 / 16
- 二、女书的古老性 / 25
- 三、女书的原生性 / 28

第三章 女书与平地瑶的关系 / 36

- 一、平地瑶的分布和语言 / 37
- 二、文献资料记载中的瑶文 / 41
- 三、广西钟山、富川, 湖南江华等县平地瑶流传的女书文字 / 48

第四章 女书与民俗文化 / 54

- 一、女书流传区的女性社交习俗 / 54
- 二、女书坐歌堂 / 64
- 三、女书哭嫁歌 / 68

第五章 女书书法 / 75

- 一、女书书法的审美价值 / 75
- 二、女书书法的流派和推广 / 79

第六章 女书文化研究批评 / 93

- 一、女书文字的真伪问题 / 93
- 二、女书作品的翻译问题 / 95
- 三、女书字典的编撰问题 / 104

第七章 港台和海外学者对女书的研究 / 111

- 一、港台学者对女书的研究 / 111
- 二、日本的女书热 / 116
- 三、其他国家对女书的关注 / 121

第八章 女书的保护与抢救 / 125

- 一、女书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意义 / 125
- 二、女书申报人类文化遗产项目可行性 / 127
- 三、保护与抢救女书文化的措施 / 130

附录一 湖南江永女书文化旅游开发座谈会纪要 / 139

附录二 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 / 153

附录三 女书文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 158

附录四 女书原作选——《瑶(瑶)文歌》复印件 / 188

附录五 女书书法、篆刻作品 / 199

后 记 / 222

第一章

难解的中国女书之谜

20 世纪 80 年代后,女书从偏僻的山区峒场农妇之手迎上学术大雅之堂,进入人们的视野,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成了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让季羨林这样的著名学者都觉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①而拍案惊奇,不仅是因为它太奇特、太神秘,还给世人留下了一系列难解之谜。

一、女书的发现

1982 年,原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宫哲兵来到了湘南一代瑶族聚居区考察。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上游公社了解到过去有一种妇女文字流传。宫哲兵在当地没有找到资料,随即来到江永,拜访了当时还精通女书的老人高银仙(时年 81 岁)和唐宝珍(时年 70 岁),从她们那里找到三本女书原件《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姑记》、《肖氏女》。并请他们合唱录音,还翻译成汉文。宫哲兵把这些女书材料、

^① 赵丽明:《中国女书合集·序》,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抄件及其录音片段,带回给本校著名语言学专家严学窘(已故)教授鉴定。严老把这种文字推荐给本单位从事语言学教学和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谢志民进行鉴定。经研究认为,这种瑶乡妇女使用的书写符号是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1983年7月,《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发表了宫哲兵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1983年8月,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由宫哲兵、严学窘合作提交了《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一文,这篇首次在国际性会议上介绍女书的论文立即引起了国际汉藏语言学家们极大的兴趣。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哈里·诺曼教授在给严学窘的信中写道:“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我相信它将引起语言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极大的兴趣。”自此,女书一下从偏僻的鲜为人知的山村农家妇女手中走了出来,中国女书立刻成为中外学人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和关注的焦点,这一发现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大发现之一。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女书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国家博物馆收藏了民国时期曾担任过蒋介石高级参议的袁思永珍藏的一篇女书作品——《瑶(瑶)文歌》及其《序》。《序》言:“一九四五年,何晓南持瑶(瑶)文一纸,云是瑶(瑶)女读物,系得自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余,此固求之数年而不可得者。人手展玩,纸色红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各地瑶(瑶)户同化日久,亦罕有能读者。……”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袁思永是最早关注这种女性文字的第一人,而且他说明这件女书作品是从湖南道县田广洞获得的,这里现在还有女书流传。袁思永还明确提出这种文字与甲骨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产生远在甲骨文之前,只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他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这种文字。

20世纪50年代以来,女书作为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重新受到

一些人的重视。从1954年开始,江永县文化馆的周硕沂先生就曾专门收集过这种文字,并认识了上江圩葛潭村女书老人胡慈珠。胡慈珠把新创作的一首《蚊形字歌》(又称《女书之歌》)让周翻译成汉文,并热情地教周硕沂识这种女性专用的文字。1959年出版的《江永县解放十年志》中根据周硕沂提供的资料,写了“妇女文字”一节,简略介绍了上江圩的女书,后面还附了《女书之歌》及译文。周硕沂准备继续收集整理女书资料,但不久他被打成右派离开了文化馆,女书的调查被迫停止,原来收集的资料也全部失落。1979年,周硕沂重新回到文化馆,负责执笔编写《江永县文物志稿》,周硕沂根据原来写的“妇女文字”编写了“蚊形字”一节,较详细介绍了这种女性文字的流行地域、使用范围。

1958年,有一位江永妇女到北京办事,她说的话没人听懂,写的字无人看懂。公安部门只好把她写的字送到文字改革委员会,请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辨认,他也辨认不出。1961年,文字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又拿来写着有“江永妇女字”的材料,请教周有光先生。周有光把它当作一般的少数民族文字或稀有文字没有给予重视。

1957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杂志社潘慎收到湖南省博物馆李正光寄来的一包女书稿件,其中有女书原文抄本20余本,蓝布帕书1件,扇章1把。潘慎根据这些女书资料及李正光对女书的介绍,写了一篇约3000字的专题文章《稀有文字——妇女字》,准备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后因潘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苏北大丰县上海农场劳动改造,这篇文章一直到1987年才在山西的《语文研究》发表。如果没有“文革”的波折,也许女书也就不会到20世纪80年代濒临灭绝时才被挖掘出来,许多谜团也不会留到现在还解不开。